

改革需最大限度营造社会共识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全面部署。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新理念，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七大又提出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在内“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可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每一次进步，都得益于思想解放实际进程的不断拓展。

十七大已把全面改革的任务提出来了，十七届二中、三中全会也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改革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但要真正把这些改革深入下去，必须最大限度地营造社会共识，以新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去面对新的复杂形势。

一要打破陈旧观念的束缚。新阶段的改革，需要有新的超越。尤其是我国进入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新阶段，改革与过去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涉及的范围更广。没有新的解放思想运动，改革很难顺利推进下去。在今年人大会议记者问中，温总理多次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并先后引用两处名言古语：一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处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还强调“解放思想运动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成功，到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

二要大胆突破过去的一些理论“禁区”。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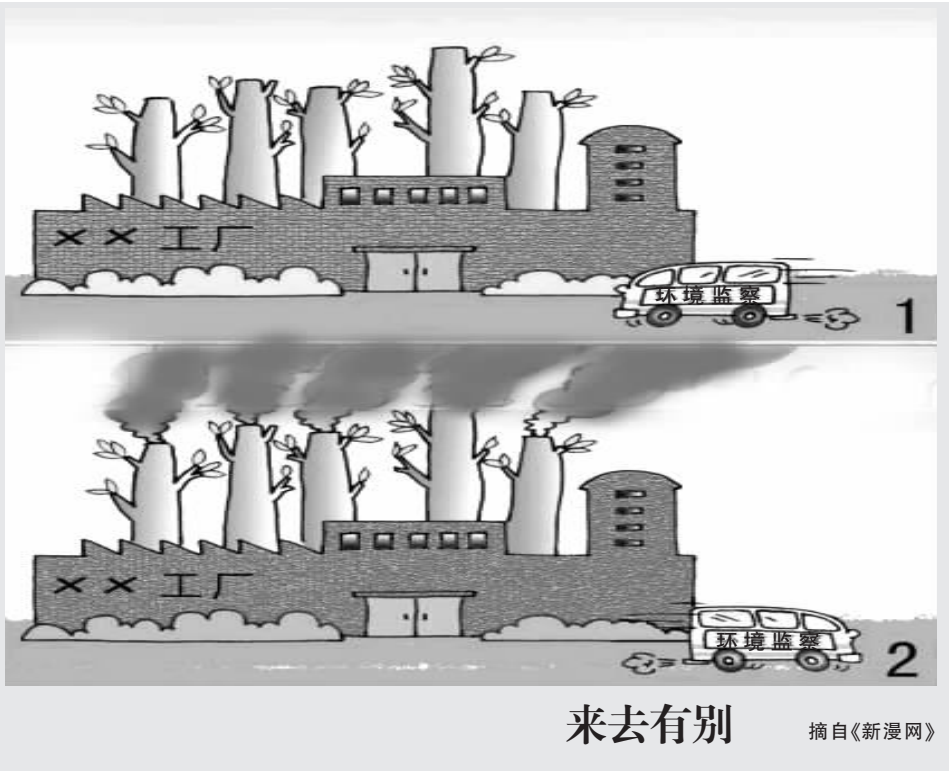
是要讲新话，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如果有禁区，很难叫解放思想。邓小平已经说得很彻底了，经济领域里面姓“资”姓“社”的问题已经不需要争论了，还有什么可束缚的呢？我们谈思想解放，是说束缚我们思想，不能想、不能说的、不能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恰恰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说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平等、博爱，有什么不能说的呢？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的发展离开这些怎么行呢？现在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搞大部门制，决策、执行、监督三者既要协调又要制衡，这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有分离才有利于建立监督和约束机制。但

过去都认为是禁区，只有解放思想后才能提出来。

三要打破不利于改革发展的惰性。这几年，中央多次把 GDP 增长的预期压低，主要目的在于使我们从片面关注 GDP 中解脱出来，加快改革步伐，调整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是，落后地区说我们处在跨越式增长的阶段，GDP 不增长怎么办？发达地区说我们的基础好，增长潜力大，有条件实现更快的 GDP 增长。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宏观经济的压力在增大，包括通货膨胀的危险，经济从偏快走向过热的危险。因此，需要以新的解放思想创造新阶段改革的动力，打破沉溺于 GDP 增长的旧观念中不思改革的倾向。

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

吴宏岐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撰文指出，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隋文帝仁寿四年发生的仁寿宫之变，是隋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杨广、杨素在政变之后秘不发丧，是为了让杨素之弟杨约有时间控制京师大兴城的局势。仁寿宫与京城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政变的消息不易传到京师，这为杨约轻松控制京城局势、确保政变最终成功提供了可能。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来去有别

摘自《新漫网》

观点集锦

创新办报理念要突出“独家功能”

汪谷震、高文光在《新闻战线》2008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纸质媒体较之于其他媒体形态有不少“独家功能”，过去只是没有凸显而已。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就要放大这些“独家功能”。一是变“独家新闻”为“独家分析”。未来多媒体时代，媒体形态多样化，传播速度同步化，人们第一时间获得信息的来源可能不再是报纸，报纸媒体向以“独家新闻”继续取胜越来越困难。但是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和深刻分析，将是报纸的独到之处。二是变“越来越厚”为“越来越精”。过去办报强调“一报在手，样样都有”，版面越来越多，报纸越来越厚，但无论如何报纸的容量与互联网的信息量是无法相比的。要在采编模式上由过去的面面俱到转到重点选择，在众多的信息来源中为读者选择和提供最真实、最深刻和最有价值而又必读的部分，让报纸成为新媒体的“精编版”。三是变“报道重心”为“策划重心”。报纸紧紧依靠内容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要把重心转到创意策划上来，提高报纸的整体运作水平，全方位进行创意策划，目标是要不断出新出彩。四是变“单纯营销”为“整合营销”。必须转变单纯销售观念，报业经营要引入整合营销观念，进一步延伸报纸的销售产业链，重新打造报业销售链，打开销售宽度，吸纳整合影响，用足盈利资源。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问题与对策

戴京、隋兆鑫在《环境保护》2008 年第 6 期

撰文阐述了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存在以下问题：1.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较低。中国公众总体上缺乏环境意识，并且对环境恶化的认识与中国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说明公众对环境变化的趋势盲目乐观。2.公众参与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现有的法律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并且公民及其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不明确，甚至没有地位，公众参与与民主决策、参与国家管理的机制尚未建立，更没有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的激励机制，使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过程中举步维艰。3.参与机制不健全，参与渠道不顺畅。中国目前在机制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存在一定的，使得一些公众有心参与，却苦于没有相应的渠道而放弃原有的计划。因此，要改革当前的环境教育制度，要转变公民的思想观念，要让环境决策民主化，完善行政公开制度，拓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建立和发展环保社团。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

吕明灼在《孔子研究》2008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崂山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一家”的格局：一、三教共“和”。中国是一个讲“和谐”社会、讲“中和”哲学的国家。我们自古就有“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之说。三教合一的形成，也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特点有关。二、三教同理。三教虽异，但在社会追求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即共同承担着教化民众的职能，从而达到国治的目的。三、三教互补。三教互补，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其中最可称道、最为精彩的是儒佛间的互补。儒佛不仅势力最雄厚、理论最

博大，而且是中外两种文化类型的宗教之间的交融，最具典型意义。四、三教共进。三教在相互关系的发展中，有多方面原因促使其互相融合。一个是迫于压力，特别是面临生存危机时，他们会作某些或大或小幅度的变革，以适应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五、三教一家。由于处于一个大中华文化体系中，三教合流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三教一家，不仅是学者的共识，也是三教的共同愿望与共同主张，只是它们各自对在“家”中的地位认识不同而已。

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

付允、汪云林、李丁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撰文认为，低碳城市就是通过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成结构优化、循环利用、节能高效的经济体系，形成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实现城市的清洁发展、高效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有：基底低碳(能源发展低碳化)，从基底上改变能源供给，加速从“碳基能源”向“低碳能源”和“氢基能源”转变，将彻底实现城市的低碳和零碳发展；结构低碳(经济发展的低碳化)，我国需要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从结构上实现经济的低碳、高效发展；方式低碳(社会发展的低碳化)，人们要改变以往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支撑低碳(技术发展的低碳化)，为获得低碳技术，我国城市一方面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另一方面通过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重点攻关中短期可以获得较大效益的低碳技术，尤其是针对重化工行业能耗的新技术。

蒙古族的马崇拜及其祭祀习俗

苏日娜、闫萨日娜在《内蒙古大学学报》撰文指出，蒙古牧人常常赋予马以神性，把马视为神灵和保护神，因此，对马的图腾崇拜不仅仅表现在蒙古族的生、活中，而且也反映在蒙古族的祭祀习俗中。马崇拜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崇拜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祭祀文化，丰富了蒙古族的民俗文化。自古以来，马在蒙古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及历史实践和马对蒙古民族的功绩，造就了蒙古人尊马、崇马的思想观念。马是蒙古族的象征，也是蒙古人的骄傲。对于蒙古族来说，马既是战胜自然的结果，也是战胜自然的有力工具。它张扬了蒙古族的威风，增强了蒙古族的力量，开拓了蒙古人的视野，推动了世界的文明。蒙古族自从与马结缘后，便在马身上寄托和传承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常常赋予马一种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而加以神化并崇拜，祈求得到它们的保护和恩赐。久而久之，蒙古族对马就产生了一种深远的生命认同观念。

孙中山实现民生的未了方案

王新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撰文指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振兴实业”和“平均地权”应该说是辛亥革命时期民生的两翼，前者解决生产落后的问题，后者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以发展生产解决分配不公，最终实现人民共享富裕。这也是孙中山制定革命纲领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和内容。正是有了这样的民生主义方针，孙中山及其同仁们才会在民国初年积极开展“振兴实业”活动，并影响到社会各界而形成一场令人瞩目的民生主义运动。

晚清酒税政策演变论析

肖俊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08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清代前中期因担心酿酒耗费粮食过多，政府一直限制、禁止酿酒。迄至晚清，因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窘细、军饷筹措异常艰难，而陆续开酒曲酿造之禁，并公开征税。地方政府是酒税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之也大为增加。酒税的开征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军饷筹措问题，对中国近代以北洋新军为代表的新式军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而酒税改革未受到社会的较大阻力，主要原因则在于晚清酒税的开征及变化对民生问题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积极的，一方面基于对酒税的开征及税率富于灵活变动性的经常调节，民间市场的粮食供给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一方面并未影响甚至壮大了民间传统酒业自身的发展势头。同时，酒税开征可以视为近代工商税发展的先行与试验，酒税税制的不断进化，为政府制订其他各业财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一定程度推动了晚清的税制变革进程。